

一位好友的女兒，寄來她在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我看。內容是寫她十幾歲的兒子在幼年時親手雕了一對燭台送給她，做母親的當然是萬分珍愛。兒子漸漸長大了，有一天，他發脾氣，順手拿起一只燭台扔向母親。母親于吃驚與盛怒之下，拾起地上的燭台，竟連同櫃子上的另一只一起扔進垃圾桶。兒子怔在那里，怨怒的眼神仿佛在說：“你扔吧，給你的東西，你愛怎么扔就怎么扔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她後悔了，去垃圾桶邊想把燭台拾回來，卻已被清潔工收拾走了。

她心頭感到無比的刺痛，尤其是想起兒子當時雕刻的那番心意和所花的工夫。她嘆息道：“爲什么美好的東西，總是在失去之後才覺得格外可愛？”

看着她的文章，我止不住淚水滂沱而下。我感觸于母心之苦澀，也悔恨自己既不是一個孝順體貼的女兒，又不曾扮演好母親的角色。如今垂暮之年，任縱橫老淚也冲不去心頭的傷痛。

和作者一樣，我也有一件兒子送的禮物，那是他在童年時用火柴棒搭起來的立體“快樂”二字。那真是玲瓏剔透、巧奪天工。我是那么珍惜它，把它放在玻璃櫥最妥帖最顯眼的地方。年復一年，火柴棒的紅蒂頭褪色，骨架因膠水漸漸脫落而鬆散了，它已不能豎起放，我只好把它小心地收在一只盒子里。幾度搬遷，我總是小心地帶着它。現在，它就放在床邊書架上，我常常端起盒子細看，真不能相信這是兒子的杰作。悠悠二十年歲月的痕迹，都刻在那一根根帶有微塵的暗淡火柴棒上，而它所給予我的是一份誠摯的“快樂”。我心里有太多的感激，也有太多的感慨。

記得那個深夜，他把房門關得緊緊的，亮着燈不睡。我以爲他在偷看從攤上借來的臟兮兮的“小人書”，幾次敲門催他睡，他只是不理，我氣得一夜未睡好。次日早晨他上學了，卻見書桌上端端正正擺着這件精緻的手工，邊上一



兒子的禮物

作者:琦君

樂了好多時日啊！

他漸漸長大了，我們母子時有爭吵，他曾憤怒地出走，數日不歸，我守着虛掩的大門，通宵達旦，看着“快樂”二字泫然而泣。固然兒子並沒像這位朋友的孩子那樣，拿起自己做的手工扔向我，但他對我珍惜這件禮物所表現的無動于衷，卻使我心酸。每次央求他修補一下火柴棒的骨架，他總是漫不經心地一再拖延。我瞭解這是無法勉強的，時光不會倒流，童稚親情不復可得。兒子成人了，我已老了。當年母親說得對，“一代歸一代，茄子拔掉種芥菜”，母親那時已知代溝無法逾越了。

我再想想這篇文章的作者，我是看着她長大的。她在初中時，每周兩次放學後，帶了兩個弟弟，背着書包到我家來讀古文。他們專注的神情都還在眼前，一下子他們也將近中年了。她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，也嘗到了做母親的滋味。但在給我的信中，她仍幽默地說：“母親來時，總是事事看我不順眼。”這就是兩代的不同吧。

其實在我心目中，她母親是個新派人物，對子女的教育極爲開明，不像我對兒子的管教是一個釘子一個眼，無怪會引起他的反感了。

幾年前，她和雙親同來我家小聚，她的嫺靜、深思和談吐的優雅，總使我想起她少女時代的無憂神情，怎么她今天也會爲母子偶然的衝突而惱怒呢？

她在文章結尾時說：“希望兒子成長爲一個有用而快樂的人。”足見母心儘苦甘澀，卻是永遠滿懷希望的。

她道出了天下父母心，也給了我一份溫暖與啓示。

我也不再爲兒子送我的那一對骨架鬆散

的“快樂”二字而感觸萬千了。

張卡片上寫着：“媽媽，給你快樂。”我的感動無法名狀，我真是快

十九年前，我在美國參加了若翠的婚禮，婚禮是在她夫君的牧場舉行的。

十六年前，我在北京接到若翠的電話，她說她跟夫君下榻在王府飯店，沒時間跟我見面了。她問我可好，我簡單說了說自己的狀況，順便問起當年跟她一起去美國的幾個熟人，她說：“唉，那幾位呀，還只是在華人圈子里混。”她說她現在幾乎不跟華人接觸，交往的都是跟她夫君相關的白人。我問她：“你們有孩子了嗎？”她說，孩子明年出生，他們會讓孩子受最好的教育，健康成長。

九年前，我第二次去美國，妻子曉歌跟我一起去的，若翠在牧場接待了我們三天。她夫君去歐洲了，就她和她的女兒翠茜在家。翠茜那時已經七歲，上小學了，每天她開車接送。那孩子相當傲氣，對我們愛答不理的。若翠說：“翠茜能說簡單的中國話，她爸爸一再強調，孩子今後還是掌握雙語爲好。”但無論若翠怎么動員翠茜跟我們說中國話，翠茜就連“你好”兩個字也不說，總在噤里咕嚕地跟她媽媽說英語。

三年前，若翠來北京料理她父親的喪事，我們在家里招待了她一次。我們勸她節哀，至於她夫君和女兒爲什么沒一起來奔喪，我們沒問，她倒主動說了出來。她夫君正所謂“商人重利輕別離”，原來他不僅有從祖上繼承來的很大的牧場，還涉足多種商業投資，總在飛來飛去地忙他的生意。翠茜嘛，她嘆了口氣，說已經進入了叛逆期。有一天，她獨自在家，忽然來了快遞，是翠茜從網上訂購的一件T恤衫。她打開一看，大驚失色！那T恤衫上印着英文：“我要殺死母親！”我和曉歌聽了大惑不解。若翠說美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賣那樣的“文化衫”非法，人家就可以在網上兜售，購買者可以選擇內心想殺死的任何一個人的名字來要求印製。我們就奇怪：“你對女兒那么好，她心里怎

么會那么痛恨你呢？”若翠忍不住落下眼淚，她說，那是因爲，有一個問題她永遠無法爲翠茜解決——翠茜一直上的是高 尚社區的學校，那里的學生里沒有亞裔孩子，絕大多數是白人孩子，還有些黑人孩子。開始，翠茜覺得自己跟別的孩子没什么不同，但漸漸地，她就從別人眼睛里發現，她的皮膚、眼睛、鼻子……跟那些美國孩子差距越來越大。而這些特徵，都不是來自父親，而是來自母親！爲此，她無論如何不能原諒母親……

2006年我去美國，若翠來聽我講《紅樓夢》。後來，我們在曼哈頓一家咖啡館聚談，她先到，談了一陣後，她夫君也來了。她夫君粗通中文，希望我能幫助他們的翠茜“認識中國”。她把那意思跟我更具體地展開，說她原來那種“既然到了美國，就要徹底進入白人圈”的想法大錯，對她自己造成的損失

且不論，對翠茜那是毀滅性的選擇。翠茜現在的心理危機，實質上是一個身份認同問題。現在她決心促成翠茜利用假期到中國留學，學中文，瞭解中國，從血緣上、文化

上認同中國。她說翠茜的學校前些天舉行了一場“喊叫大賽”，參賽的學生要當衆高喊出自己憋在心里的一句話。翠茜參賽那天他們兩口子都去了，事前他們也不知道女兒究竟會喊出什么。翠茜那天拼足全身力氣喊出的一句話是：“我是美國女孩！”

回北京的那天，在紐瓦克機場，我驚訝地發現，若翠和她的夫君，還有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，一起來給我送行，那姑娘當然是翠茜。若翠告訴我，翠茜在“喊叫大賽”中得了冠軍。賽後不少同學找她談心，說這才知道她心里有那樣的壓抑感，也才知道他們有意無意中傷害過她，表示從今往後大家要更多地溝通。可是，翠茜卻拒絕領取獎杯。她自己用蹩腳的中文對我說：“現在，我問我，那是，誰在喊？那個人，是誰？”她沒表達盡的意思，我已經瞭然。



誰在喊

作者:劉心武

時代過去了，他還沒有過去。

現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醫師的父親，孫女回來時還依照舊俗與全家拍合照。多數時候他只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獨居在南台灣的某個鄉下，與家人不溝通，不來往。

城市的燈光囂張又喧嚷地在他身邊亮起，取代了當年的炮火。五顏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個角落，但他的人生始終是黑白的，甚至始終是一出默劇。他不能期待，不可言語——太多話會攪動人生無法承受的沉痛與悔恨。十六歲時被拉夫，二十歲來台，今年八十三歲了。一晃眼，人生唯一允許自己激動的只有兩岸開放探親時，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媽媽。媽媽啊，你身上的味道兒子四十年沒聞到了，離家時連和你跪別的孝道，兒子都沒做到！

一個甲子過去，當年一塊被拉夫的，有的戰死在壕溝，有的負了傷，勉強背上一段路，身子越來越沉，放下一探鼻孔，才知斷氣了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時日好快又好慢。每度過一分鐘，就多死一名弟兄。二十歲的青春，生命竟是倒數的，每天都在想，下一個死亡的可能是自己。沒想到來到一個陌生的島嶼，竟然一住就是六十三年。應瞬間消逝的生命，竟也這樣拖拖拉拉沒有消逝，過了六十三年。

於是，組個家，但與妻情感不睦，與兒大鬧一場，甚至登報聲明“某子從此與本人無關”。分離又怎么樣？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報廢了一半，故鄉早已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地方，死亡是常有的事，至於孤獨，唉，太小的事了！

今年父親節，我收到一封高雄徐醫師寄來的信，描述以上他與父親的故事。徐醫師現年五十歲，五十年人生里與父親的關係不是埋怨就是衝突，父子關係惡劣至爸爸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。母親爲了袒護兒子，也與父親鬧翻了。徐醫師的父親這幾年一直過着孤單的生活——年少顛沛，年老孤寂，家人也逐漸放棄了對他的關心。徐父每日唯一的精神寄託是收聽我的廣播節目《文茜的異想世界》，跟着一個老了但愛浪漫的女孩聽音樂，獲取世界資訊，聆聽不同人的故事。

父親節那一天，徐醫師通過東森財經台總監李惠惠找到我，提出了一個很特別、很感人的請求——這麼多年了，他想向父

親表達敬意，但他說不出口。一個已經不習慣表露情感的兒子，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訴爸爸：“爸爸，在大時代的背景下，我們知道你的辛苦……請文茜小姐代爲轉達我們全家人對父親的敬意。”

徐醫師請我代念的信內容大致如下：

好久沒有如此開心地醒來，
哼着哼着：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……

一首幾十年沒哼過的老歌……
好熟好美……
哥哥你打勝仗回來，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，不再插在自己頭髮上……

很氣，非常氣，爲什么總扯上了戰爭，誰寫的……
淚光中映出了爸爸這一生的經歷，
那個烽火連天，少小就離家……

破碎的年代……
……
再大的痛也絕不哭，不會哭、會忍，是我

的爹……
……
幾十年沒流淚了……

我在廣播中朗讀後，徐醫師寫了一封非常親切的信給我，並客氣地附送一大盒吳寶春麵包。他說，很高興這個父親節是五十年來他們父子最相愛的父親節。
麵包盒里，放着一張徐醫師的全家福。徐父安靜地坐着，頭髮蒼白，臉頰圓潤，無甚表情。旁人看不出風霜，望不着悔恨，只知西風殘照，歲月也殘照，畢竟八十三歲了，他已習得平靜。

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緊閉，事實上，他已沉默一生。他唯獨喜歡聽一個愛說話的（老）女孩的廣



沉默的父親

作者:陳文茜

播——她的時代有歌、有笑、有淚，但老先生的時代，只有蒼涼、悲壯。流淚不是他們僅有的權利，笑，只有人生絕望時才仰天狂笑。狂笑上天，也責問上天：這是什么時代？爲何對中國人開這麼一個大玩笑？活過二戰，再來一場更殘酷的國共內戰？

徐醫師與他父親的悲劇不是唯一的。他們父子尚可衝突，尚可埋怨，五十年後，還來得及表達敬意，王應文則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。

王應文的父親王生明，是1955年“一江山島戰役”的國民黨軍司令。當時抗美援朝已結束兩年，美軍決定協防台灣，轉向支持蔣介石。1949年蔣介石雖已失去對大多數中國大陸領土的統治權，但仍有1500公里海岸線上的島嶼掌握在蔣介石軍隊手中，從浙江台州灣的大陳島、一江山島，南至金門、馬祖及台灣。1955年王生明接獲命令“死守一江山”，等同一紙軍中死亡令。於是從大陳島出發前，一行人特別被允許先回台灣探望妻小，並由蔣介石頒贈勳章。他們是台灣當年的“神風特攻隊”，要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，打一場絕望的戰役。勳章挂在胸前，換王生明司令的一條命。

出發前，王生明一家拍了一張全家福。那個時代台北的照相館不多，多集中于衡陽路。一個照相館老闆多年後回憶：前來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錢人，而是窮困的軍人。拍的全家福中多半除

了不識事的孩子以外，丈夫、太太均無笑意，有的臉上挂着生離死別的悲傷，有的只差沒淚流滿面。

王生明的全家福上妻子滿臉悲凄，先生表情蒼茫，只有兒子王應文，大大的眼睛瞪着鏡頭，就怕自己錯過了那一瞬間。

在旺旺中時集團拍攝的紀錄片《最後島嶼》中，王應文回憶了與父親的最後一別。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碼頭，輪船已停泊在岸邊，這里已是馬路的盡頭，也是父子緣分的盡頭。父親捨不得就此分離，於是拉起不到十五歲的兒子的手。一切近在咫尺，戰火即將燃起。父親不知如何與一個尚未長大的孩子告別，於是又回頭走了幾步，送兒子至路邊車站。頓時，天下起了大雨，在空曠的碼頭——沒法避雨的時間，沒法避雨的地點，雨嘩啦啦淋濕了父子二人。父親的眼淚這才止不住地流下，在雨中盡情地宣泄他的悲傷。

時光幽暗，萬般不捨，無助的父親此時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，試圖遮擋根本擋不住的大雨。這是生命光芒走向微弱的父親能爲兒子做的最後一件事。大雨滂沱，像一個擋不住的大時代，父親必須履行他的職責，走上他的末路，出演他的悲劇，完成他的壯烈人生。手帕那么小，但代表了一個父親無力卻最感人的祝福。

王應文如今年已七十，還藏着當年的手帕，接受《最後島嶼》紀錄片訪問時，告白了一段終身遺憾：“我真後悔，當時沒有緊緊地擁抱父親。”聲聲哽咽，眉間扭曲，他在呼喚一個叫不回的時代。

往事如煙，那是對我們而言；而對歷經戰火劫難的一代，昨日其實一直近在咫尺。我認識多位與徐醫師父親有類似經歷的老兵，在由時光堆積而成的歲月里，他們多半選擇沉默以對，以不語和那驚心動魄的痛心回憶保持距離。只有月迷津渡，人一下恍惚時，才意識到自己已永遠逃離了那場難以言喻的生離死別。

當時的小們，多半僅有十五至二十歲，是還沒真正長大的小娃兒。

於是每個類似的家庭，都有一位沉默、不會表達情感，甚至表面上好似不會愛人，也不懂得愛的父親。

他們永遠只選擇站在世間蒼茫的對岸，不回憶，人生就是一條陌路。

一直走下去，走下去，走下去……走到有一天，他的孩子們終於明白時，奔向他，給他一個最後的擁抱。